

还境外长眠烈士以尊严



志愿军老兵从各地赶来迎接烈士归国

在韩国长眠 60 余年的 437 具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于 3 月 28 日在战机护航下运抵沈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等领导出席迎接仪式。高规格的仪式背后,既是还烈士以尊严,也是他们理应享有的光荣。而如何促成更多的海外烈士遗骸归国并保护境外烈士墓地,民间也寄以期待。

烈士葬身异国“是历史亏欠”

中国官方 2006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抗美援朝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的人数为 183108 人。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及特级、一

级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地烈士陵园外,约 18 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

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璜看来,“就地掩埋”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背景之下,不得不选择的方式。“中国当时太穷太苦,有太多更紧迫的挑战需要应对,这是历史对他们不得已的亏欠。今天中国国家实力变强了,我们需要弥补这个亏欠。”

境外烈士墓保护状况不一

朝鲜战场只是一个缩影。中国在抗战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境外作战和援助建设中,在多个国家都留下了烈士遗骸。这些寄身异域的墓地状况如何,关乎烈士和国家的尊严。

2011 年,媒体调查发现,海外现存的中国军人墓地中,缅甸境内的远征军墓地上世纪 50 年代后几乎被全部捣毁,在越南、朝鲜、老挝境内的墓地均由墓地所在国管理,前两者维护较好,老挝相对较差。

2013 年 7 月初,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解读《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

意见》时,首次透露“中国现有境外烈士纪念设施 100 余处”,安葬在朝鲜、越南、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坦桑尼亚、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

“晚了一点,但还来得及”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烈属和老战士申请出境扫墓,但由于国家未公开、地方政府不了解,加上部队变更,原始资料难以查找,很多人不知道亲人和战友的境外安葬地。年届八旬的烈属田淑兰,到 2010 年才得知丈夫葬在越南。2011 年 3 月,她第一次到越南北江省安世县陶美烈士陵园扫墓。分别 44 年后,她终于找到了丈夫的坟墓。

对于海外墓地,中国政府在 2011 年前并未在任何公开文件中提及。直到 2011 年 8 月 1 日,新的《烈士褒扬条例》才首次出现了有关境外烈士墓的规定:对于境外的中国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办理。

全国人大代表、军旅作家裘山山曾呼吁,中国应对境外烈士墓地进行重新整修、管理维护——这不仅仅是给烈士

以尊严,也是还国家以尊严。“虽然晚了一点,但是现在做还来得及。”她说。

期待海外烈士墓地迁移保护常态化

让烈士享有应有的尊严与光荣,是官方和民间共有的期待。2009 年 8 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回答媒体提问时承诺,中国政府将以隆重、庄严的方式纪念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抗战将士遗骸归国。这是大陆官方首次对境外国军烈士遗骸表态。

2011 年 9 月 14 日,在政府和公益组织推动下,19 名在缅甸阵亡的二战中国远征军官兵的遗骨终于在腾冲的国殇墓园安葬。这是战争结束 66 年来,中国人第一次把滞留在海外的二战阵亡将士遗骨接回大陆安葬。2013 年 9 月,近 500 位中国军人的遗骸也从缅甸回到故乡。

曾经为帮助朝鲜、越南、老挝“抗美援朝”而牺牲的中国烈士的墓地,最近几年也加强了维护。

韩国境内的中朝军人墓地一度因疏于管理而荒芜杂乱,随着中韩关系的改善,最近两年也面貌一新。

《快乐老人报》2014.3.31

毛泽东安插到老师身边的卧底

几年前,著名女学者章诒和的两篇文章,涉及到一些文化名人卧底的事,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争议,而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毛泽东安插在老师身边的超级卧底王秉璋。

事情发生在 1967 年 2 月 13 日和 16 日两个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在会上,以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为一方;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等为一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会议记录送毛泽东后,他看到陈毅的发言中重提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勃然大怒。2 月 18 日,他把叶群叫到住所谈话:“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永远忠于毛主席。毛泽东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

这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又批评,又挖苦。接着,不但在政治局会议上让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受批判,在军委会议上让他们作检讨,还在全国掀起了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3 月 14 日,中央文革甚至在北京举行了十万人的大游行。

几位元帅和副总理挨批以后,毛泽东还是不放心,特别担心老师们在军队中的影响。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述:

“毛泽东就想起了几位老师,不知道在批判了他们以后,这几个人在背地里有什么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毛泽东想知道他们在西山究竟在干什么,就想派人去暗地里察看一下。

毛泽东要叶群乘机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师們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师们在干什么,说些什么,都有哪些活动,有没有串联?

后来,王秉璋通过我转给毛泽东的报告至少有两个。在报告里,王秉璋把他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大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起散步、谈话什么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两个报

告都说,老师们在受到批判以后,接受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一致认为这个运动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用很大。”

吴法宪在书中评论:“王秉璋实际上是做了一件好事,他这两个报告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几位老师的作用。”1967 年五一节,毛泽东批准除谭震林以外的其他老师和副总理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们总算暂时过了一关。

王秉璋 1955 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七机部部长兼空军副司令。文革初遭到揪斗、关押,得了肝炎,他的妻子通过吴法宪、叶群找林彪求情。林彪让叶群报告毛泽东,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也要两弹一星,于是同意解放王秉璋,还派他到老师們身边卧底。到底是老师們真的“接受教训”,转变了态度?还是他们意识到王秉璋为何而来,有意表现给他看?或是王秉璋同情老师,专拣毛泽东爱听的写?只有天知道了。

新华网 2014.3.17

那些“被歧视”的中国制造

中医因“经验科学”而受质疑

中医作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医术,一直在为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负责。但是,在西方一些学者眼中,这门“经验科学”不甚科学,口口相传的经验可能有捏造、夸大的成分,难以确定什么真的有效、有效成分是什么、毒副作用等。没有经过对人体结构的严格掌握、对药物没有进行大量的临床试验和统计,这些都成了西方人质疑中医和中药科学性、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理由。

天文与西方“几何学”差之千里

早在《易经》中就已经出现了“天文”一词。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天文”具体含义被指为天象,包括天体运行所呈现的景象和与天体本身有关的现象;另一方面,它其实是一种“星占学”,根据天象的变化,预卜吉凶,为帝王行事提供指导。

而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前身是希腊古典天文学。希腊人用匀速圆周运动这种完美的运动来描述行星的视运动,他们寻找各种圆的组合方式来解释和预言行星的运行建立几何模型。因此,从本质上来看,西方人将天文学看成一种几何学。

历法被认为政治含义过浓

历法也可被归于天文学一类,堪称中国古代最精密的知识体系。它致力于最精确地描述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以历法最精密的推算项目交食预报为例,预报交食发生的时刻和方位等,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中国的历法含有十分明确的政治含义,如《史记·历书》称:“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改正朔”就是改革历法,这是王朝更替首先必须要做的大事之一,因为它是政权确立和获得承认的象征。

哲学缺乏逻辑规则和思辨色彩

中国古代无哲学?这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很不可思议,孔子、孟子这些先贤算什么呢?在西方人眼中,哲学是一门“思辨”的科学。如利玛窦曾经说过,中国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而不是思辨哲学。

他说,“中国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为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各个分支相互内在的联系。”除此以外,黑格尔、文德尔班、莱特、德里达等都持“中国哲学”质疑论。

火药配置过低不适合火器发射

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但是,有观点认为,中国制造的黑火药由于含硝量太低、杂质太多、燃烧后膨胀能量不足,并不适合于做火器的发射药。真正火药的标准配置来自欧洲和阿拉伯,他们将含硝量提高到 75%,才能够适用于做火器发射药。

《重庆青年报》2014.4.2

大保定往事



保定,摩托车驶过某主打高端客户的楼盘的户外广告牌。

生在这里。

而到了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后,作为翊卫京师的京畿重地,保定逐渐成为河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

1403 年,朱棣称帝,定都北京,北平行都司复名大都司移驻保定,保定开始成为保卫北京的驻兵之地;清康熙八年(1669 年),直隶巡抚移驻保定,保定始为直隶省省会,为清代八督之首。

位于裕华西路一端的直隶总督,李卫、刘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等当年权倾朝野的一代总督们,都在这里饮过酒,喝过茶,感慨过人生和历史的无常。